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意关系的修辞学阐释：汉语“双重意义修辞”研究 / 马惠玲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0730-330-5

I. 言… II. 马… III. 汉语—修辞学—研究
IV.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949 号

言意关系的修辞学阐释

——汉语“双重意义修辞”研究



作 者—— 马惠玲

责任编辑—— 刘 娴

封面设计—— 肖 艳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30-330-5/H·37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序	李熙宗	1
绪 论		1
第一节 引言：历史与现状		2
一、萌芽发展时期：古代的双重意义修辞研究		3
二、修辞格本位研究时期：20 世纪初到 80 年代		8
三、转型变化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以后		11
第二节 内容与结构		14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和意义		17
一、研究方法		17
二、研究思路和意义		18
第一章 汉语双重意义修辞界说		22
第一节 双重意义修辞		22
一、意义和双重意义		25
二、语表意义和字面意义		29
三、语内意义和含意		35

四、语内意义和语表意义的关系	40
第二节 双重意义修辞与歧义	43
一、双重意义修辞和歧义的区别	45
二、双重意义修辞对歧义の利用	52
第三节 双重意义修辞和传统辞格	55
一、辞格研究及其局限	55
二、从传统辞格研究到双重意义修辞研究	56
三、双重意义修辞与传统辞格的关系	57
四、双重意义修辞与传统辞格的不同研究理路	59
第二章 双重意义修辞的内部结构与意义联系	60
第一节 双重意义修辞的形式构成特征	61
一、可分离性	61
二、符号—结构—意义的错综关系	63
三、形式与意义的系联方式	66
第二节 双重意义修辞的意义关联类别	68
一、双重意义修辞的主要类型	69
二、心理旋转理论对双重意义修辞类型的阐释	76
第三节 双重意义修辞的意义对应范式	80
一、双重意义具有跨域性	80
二、双重意义修辞的基本意义对应范式	84
第四节 从典型理论看双重意义修辞系统	99
一、典型理论和递差原则	99
二、双重意义修辞类聚系统	100
第三章 双重意义修辞建构与接受过程	106
第一节 双重意义的建构	106

一、超常的话语启动动力	107
二、多重关注的意图指向	110
三、修辞策略与意图指向的关系	111
四、相关话语材料的提取、介入	115
五、关联的建立和意义关系的安排	118
六、认知结果的物化形式和关联点的凸显	121
第二节 双重意义修辞构建的思维映射类型	123
一、具象式映射	124
二、类比式映射	127
三、离析整合式映射	131
第三节 双重意义修辞的接受和推理过程	137
一、双重意义修辞接受的特征	138
二、双重意义修辞的接受推理	143
三、双重意义修辞推理过程的类例分析	148
第四节 双重意义修辞的跨文化接受	160
一、简化语域的制约	165
二、超越汉语系统的新组合	167
第四章 语境与双重意义修辞	169
第一节 国内外语言学界关于语境问题的研究	169
一、国内外主要的语境理论流派	169
二、不同的研究角度	171
第二节 场景、方式与双重意义修辞	173
一、场景	175
二、方式	182
第三节 双重意义修辞中的交际者	185
一、言说者与双重意义修辞	186

二、言说者与接受者的关系与双重意义修辞	191
第五章 双重意义修辞的文化阐释	198
第一节 传统思维方式与双重意义修辞	200
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和双重意义修辞	200
二、辩证思维方式和双重意义修辞	212
第二节 民族心理和双重意义修辞	217
一、中和心理	217
二、趋吉避凶心理	229
三、崇智心理和追新求异的表现	234
结 语	244
参考文献	247
后 记	256

序

马惠玲的《言意关系的修辞学阐释——汉语“双重意义修辞”研究》就要出版了。在言意关系问题的探讨中,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论著。

该书以其研究上的独特视角,在言意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做了新的拓展。言意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哲学、语言学、美学等诸多不同学科一直受到关注,各种不同角度的相关研究可说是层出不穷。但综观以往的相关研究,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一般理论意义上的探索。而《言意关系的修辞学阐释——汉语“双重意义修辞”研究》则是着眼于言语交际活动的动态过程,由对语言表达形式与意义(“言”“意”)关系的变化形成“双重意义修辞”的规律的探索进而涉及言意关系问题的,这是对言意关系的一种独特的审视角度。从这一角度出发,该书集中以汉语中具有语表意义和语内意义双重意义的这一特殊的语言修辞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其在实际的言语交际过程中由“言”“意”关系变化以形成“双重意义”种种修辞手段的有关规律,并运用现代语言学和各种相关学科的理论作出科学的解释。这一视角研究的重心和主要目的,就在于研究实际语言运用中言语形式与意义间的不同关系和关联方式,以及语义的传导过程和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意义的变化,并于此基础上进而归纳概括出各种语义结构形态,在认

知背景上揭示其复杂的生成根源,找出其间的意义组合规律,从意义的角度重新审视修辞现象,按照特定类聚系统的要求归纳出语义系联模式,揭示不同构成形态之间在特定功能和特定方法上的差异,从而确立并提供可供检验的便于学习和理解的典型范式的双重意义类型,建立起双重意义修辞的相关形态系统。可见,这一视角研究的言意关系,是一种具现为(由双重意义构成的)不同表达手段而实质则是语言运用时在语义传导过程中语言形式与意义间的关系变化这样一种“言”与“意”的关系。这类言意关系及其探讨跟一般理论意义上的言意关系及其探讨是并不完全相同的:这种视角的研究所注重的是实际语言运用过程中的言意关系变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这固然也具有一般理论上的意义,但更重要的则是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在把握相关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其关系的变化以构成具有特有表达效果的双重意义的表达手段,因此对语言实践尤其有着深刻的意义。

把“双重意义修辞”的各种表达手段“归结”为一个整体类型,并置于同一理论平台上做多角度的探悉,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人类的语言交际活动中,由于构成形式和表达效果的特殊,“双重意义修辞”是一种有着很高使用几率的修辞现象。但实际上,所谓的双重意义修辞指的是利用语言表达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变化而形成的各种相关的语言表达手段的一个总称;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由这种“言”“义”关系的变化而构成的相关的表达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构成单位和结构形式的不同看,就有以词语、句子、句段乃至语篇构成的,也有以特有的结构形式包括修辞格构成的,等等。对“双重意义修辞”历来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以往的研究,一是比较注重于“双重意义”构成的个别手法的各别研究,而未能将其“归结”为整体的一类而置于统一的理论平台上做集中而系统的考察;二是对有关现象的描写性分析较多,而深入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就其深层的运行机制的揭示和理论解释显得不够。而《言意关系的修辞学阐释——汉语“双重意义修辞”研究》则注意努力克服上述的

不足,将基于“双重意义”的分散的各种语言表达手段包括由词语、句子、句段乃至语篇,抑或修辞格构成的“双重意义修辞”的各种具体表达手段“归结”为一个整体类型,并将其置于同一的理论平台上进行理论分析解释。这一研究变对双重意义修辞的具体手段的分散研究为集中的整体性的探讨,利于借用多种学科的理论,统一地对这种语言运用现象从多种角度、多个层次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形成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结论和理论成果。该书中对有关结构特征、意义关系、运作过程、形成背景等问题之所以能得出更具系统性、更有深度的规律性的揭示和解释,是与此密切相关的。这种将“双重意义修辞”不同表达手段“归结”成一个整体类型并作为集中研究的对象的做法,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利于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作出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对加深对双重意义修辞现象本质的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大致上建构了一个有关“双重意义修辞”研究的系统框架,这是该书的又一特色。该书对由“双重意义”所形成的种种表达手段进行“归结”,和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论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双重意义修辞”的概念并设想了相应的研究视角和明晰的整体研究思路。其中,不仅确立了“双重意义修辞”研究的诸如“语表意义”、“语内意义”、“双重意义”等核心概念和术语,并对其与相近概念如字面意义、含义、言外之意、歧义等的区别与联系问题作了分析界别;作为研究框架的主要构成部分亦即研究的主要对象和中心内容的,则是对双重意义修辞的形式构成特征、意义关联类别、双重意义修辞的构建与接受过程的研究;此外还分别从双重意义修辞与语境、与文化等联系的角度对双重意义修辞的产生以及作为一种修辞现象本身所体现的文化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上各种不同的研究角度的综合形成了一个有关双重意义修辞现象研究的系统框架。并且正是由于将有关双重意义的修辞现象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纳入这一研究系统框架中,才便于运用现代语言学的诸多学科如语用学的会话理论、合作原

则、言语行为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典型理论、关联理论,以及诸多相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更为深入的理论层面对在动态的语言运用过程中的双重意义修辞现象进行新的探悉,做出别出机杼的分析论述;而这一研究也在显示出系统性的同时,具有了深刻性,理论解释和研究方法都显示出了新意,形成了不少值得肯定的创造性见解。例如有关双重意义修辞的形式构成特征的可分离性、符号——结构——意义的错综关系、形式与意义的系联方式的分析;关于承载双重意义的物质材料与意义生成的关系的论析;有关多义类、同义类、反义类的双重意义修辞的意义关系类别的区分;有关双重意义修辞形成和构建的原因、思维映射类型和有关双重意义修辞的接收和推理过程的论述,都不失为是言之成理的创造性见解,且显得条理清晰,具有系统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深化了“双重意义修辞”现象问题的研究。

《言意关系的修辞学阐释——汉语“双重意义修辞”研究》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语言学著作。当作者从古城开封来电告诉我,由于得到学校科研经费资助该书能得以出版并要我写个序言时,我是很为作者感到高兴的:这不仅因为在今天学术(尤其是语言学)著作出版极为不易的情况下作为一本有特色的学术论著能问世,而更在于作者研究和撰著该书时所遭逢的境况是那样地使我为之感动:她是在忍受着接连遭受祖父、父母、弟弟的离去的丧亲之痛,而以超乎常人的坚强毅力才完成了撰著工作的,现在这部寄托着作者学术追求、对亲人怀念的学术著作能得以面世,这确实是值得高兴的!当然,在此我还想说,该书倘能对双重意义修辞现象与一些密切相关的修辞现象间的复杂关系做更为精切的梳理、辨析和剔易,则内容将更加集中、精当。

是为序。

李熙宗

2007年3月20日于复旦大学凉城宿舍

绪 论

汉语双重意义修辞现象是在汉语的运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语言修辞现象。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一般情况下,言说者传达出的意义是语言表达式本身的意义,人们就语言形式本身获得意义,这种意义是话语的表层意义,即语表意义。但在某些情况下,言说者为了一定的表达意图,有意使语言表达式传达出的意义不仅是语表意义,而且还包含一种与语表意义相对的意义,由于这是用与传达语表意义相同的形式传达的“内蕴”意义,立足于形式与意义关系的角度,我们称为语内意义。这样,同一语言表达式便具有双重意义。双重意义修辞就是有意利用语表、语内意义的关系,使得“言在此,而意在彼”来产生一定的表达效果的修辞现象。

双重意义修辞现象有多种表现,传统修辞学列为双关、反语、婉曲、讳饰、借喻等辞格涵盖的语言现象和一些委婉语、隐语、歇后语等,虽然它们表达意义的方式不同,有的一语双关,有的从反面表达,还有的表达较为隐晦曲折,但比较其语言表达式传达的意义和实际传达的意义,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既具有语表意义又具有语内意义,因而都属于我们所研究的双重意义修辞范畴。

第一节 引言：历史与现状

汉语双重意义修辞现象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周南·芣苢》）芣苢“据《毛传》说是车前，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这是它的一重意义；另一方面，古音‘芣’读如‘胚’；苢‘和’胎’同音，因此‘芣苢’与‘胚胎’古音不分，借这种谐音关系，又表示‘胚胎’或‘宜子’的意义，因而具有双重意义。”①又如：“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邶风·新台》）这是讽刺卫宣公强占太子伋的新妇的诗。闻一多《说鱼》认为“鱼喻太子（少男），鸿喻公（老公），鸿、公谐声，鸿是双关语”。②因此“鸿”可用来表达双重意义。再如：公曰：“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这里“食”有“吃”的意思，但暗含有“伪”的意思，《尔雅·释詁》中有“载、谩、食、诈，伪也”之说。利用二义的不同，既可以和“肥”搭配，又可以和“言”联系，巧妙地表达双重意义。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也指出：“哀公以‘食’之诈伪意属‘言’，而以‘食’之啖噉意属‘肥’，使之一身两任，左右逢源，《正义》颇识斯意。”③从先秦时代开始，双重意义修辞现象在中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少成功的使用，出现了一些经典的范例。

在商品经济的今天，双重意义修辞更被赋予新的内容和手法，许多带有功利目的的产品和事物，通过巧妙的构思化为双重意义话语的内容，使双重意义话语因其实用性和特殊效果受到商家青睐。如：“中意冰箱，人人中意。”“中意”是冰箱品牌，又含

① 李定凯编校：《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42页。

② 同上，第77页。

③ 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8页。

有中国和意大利合资、合消费者的心意之义。广告用意为请大家选中意冰箱,成为商家推销产品的得力助手。中华牙膏广告词:“四十年风尘岁月,中华在我心中。”“中华”既指我们的祖国,又指代该厂的产品——中华牙膏,二者结合得合情合理。上海三菱电梯销售部的电话号码是4303030,与公司“三菱”名谐音,有趣易记,等等。

可见,双重意义修辞现象是一种起源较早的,具有旺盛生命力和极强表现力的语言运用现象。随着双重意义修辞的大量使用,也开始有人对这种现象有所关注,但遗憾的是,有关该问题的探究多是零星的、片断的,至今很少有专文予以讨论,更不用说关于此类现象专门、系统的研究了。下边我们就对这种零星的、片断的探究稍加钩稽,这不仅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也会使我们研究的意义更加显豁。

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为了显示该方面研究自身固有的演进逻辑,我们将有关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一、萌芽发展时期:古代的双重意义修辞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化漫长的进程中,与双重意义修辞有关的研究萌芽很早,这些早期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的层次和方向上进行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思维中,习惯于将形而上与形而下区分开来,将“道”与“器”区分开来,早期的相关探讨也是在理论的和技术的两个层次上展开的。

我们首先看技术的层面。在古代存留下来的大量宝贵的语言材料中,可以看到不少有关双重意义修辞的具体记载和初步探讨,它们零星地、片段地、散金碎玉般地散见于文论、诗论和其他文献之中。据文献记载,距今约三千多年的先秦已有有关隐语使用的记载。如《吕氏春秋·重言》:“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隐。”^①到

^① 陈奇猷编著:《吕氏春秋校释》卷十八,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156页。

了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对“避讳”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公观鱼于棠,何恶也?……观鱼犹言观社也,皆讳大恶之辞。’^①(《玉英第四》)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玉英第四》)说明运用避讳的方法,就可以天下太平,还可以明哲保身。^②当然,这里董仲舒对避讳的讨论主要是基于政治学立场上的,对避讳的语言机制则较少涉及。后来,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风操》中也谈到了避讳问题,他介绍了避讳的规律,提出了避讳使用的范围和尺度,对过度和不当的避讳提出了批评,如“或有讳云者,呼纷纭为纷烟;有讳桐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似笑耳”。^③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专立《隐秀》一章,其中主要讨论的就是怎样通过语言手段使文章意义含蓄深刻。“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④揭示了“隐以复意为工”的本质和价值取向,首先提出语言表意的两种方式,即隐与显,这在双重意义修辞的研究史上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唐宋时期,对双重意义修辞的研究趋于深化。皮日休把使用双关比解语的诗称为风人体。他在《杂体诗序》中说:“诗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近乎戏矣。古诗或为之,盖风俗之言也。古有采诗官,命之曰‘风人’。‘围棋烧败袄,

① 《春秋繁露》卷三,中华书局1975年9月版,第77页。

② 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③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5页。

④ 刘勰:《文心雕龙》,见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59页。

着子故依然。’由是风人之作兴焉。”^①皮日休说明了诗歌中使用双关语的源流,指出它来自“风俗之言”的民间口语,并说明了它“近乎戏矣”幽默风趣的特点。南宋的洪迈收集了南朝乐府民歌中大量的双关比解语,并从中概括出它“每以前句比兴引喻,而后句实言以证之”^②的结构上的特点,显示出前人对比解语的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唐宋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与双重意义修辞有关的,或主要以双重意义修辞为关注对象的著作。如唐代李商隐的《杂纂》辑录了不少当时口语中流行的同义比解语。如:不相称:病医人,瘦人相扑,屠家念经。怕人知:贼脏,匿人子女,透税。宋代王君玉的续纂《杂纂》和署名为苏轼的《杂纂》也辑录了不少当时口语中流行的同义比解语。宋代的一些文论对于双重意义修辞原则的确立有一定的意义,如不仅潜心诗歌创作而且精心结撰诗论的叶梦得在其《石林诗话》中就提出了“思与境偕”、“意与言会,言随意遣”^③的原则,突出了“意”在表达中的重要作用,被称为我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的陈骙的《文则》中论及“蓄意”,认为“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事之载也,以蓄意为工”。^④并举例说明不直接说出本意,不直接描写事件本身,而让读者去体会蕴含其中的本意的“蓄意”手法等等,这些对于确立双重意义修辞中的言意关系有指导作用。唐宋以后,对双重意义修辞的研究继续有所发展,认识进一步深化,如明代谢榛的《四溟诗话》,在谈论诗的修辞时就总结出了“指物借意”^⑤的双关现象,这

① 皮日休:《杂体诗序》,见《松陵集》卷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六,见《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609页。

③ 叶梦得:《石林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9月第2版,第406页。

④ 陈骙:《文则》,见《文则·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7页。

⑤ 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见《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6月版,第52页。

是双重意义修辞的典型范式。

在对这些“形而下”的具体手法进行描述、归纳的同时,古人还对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涉及哲学、语言学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这些理论探讨虽不与双重意义修辞直接相关,但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对我们所要开展的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是有启示意义的。例如言意关系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就是一个由来已久且备受关注的话题。“言”和“意”首先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周易》、《老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典籍都涉及“言”和“意”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对言意关系的讨论经过了先秦、两汉、魏晋等几个不同时期,魏晋时期有名的“言意之辩”是哲学意义上的言意关系探讨的聚焦点,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言与意的关系是:言为意之“工具”或“手段”,意为言之目的。《庄子·外物篇》云:“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和“意”是联系的又是分离的。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散见于许多地方,从先秦开始对言意关系的思考便展现为两条思路:即言尽意论和言不尽意论。大体而言,先秦儒家、墨家的观点是认为言可尽意,《周易·系辞》中,言可尽意的观点表达得就较充分,如:“子曰:‘圣人之言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意。’”(《墨子·经说上》)也说:“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肯定通过“言”能够把握“意”。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法言·问神》中曾说:“故言,心声也。”被总结为“言为心声”这一成语。魏晋时代著名的言意之辩中,欧阳建是“言尽意论”的代表,他认为,意义是客观的,语言作为认识的中介,也是客观的。人要认识世界的意义,必须通过语言,语言的意义就是世界的意义。从语言学角度讲,这是一种指称理论,语言所指称的对象,就是客观事物及其意义(理),二者是同一的。他充分肯定了语言的作用,有其内在合理性,但他又忽视了语言在表达意义方面并不是没有局

限性这个事实。^①

最早提出言不尽意论的是老子《老子·第一章》开宗明义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含有宇宙本源和普遍规律双重意思。《老子·第一章》里提出的“道”和“名”，虽然和后来的言意之辩中的“意”并不等同，但他认为语言和概念是不可能概括和表达“道”和“名”的。第一次揭示了语言表达的局限性。老子这一命题的提出对后世言不尽意论者影响很大。庄子发展了这一观点，并形成比较完整的言不尽意论观点，有许多探讨言不及意、言意相违的著名论述：“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等等，不一而足，庄子将言不尽意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就认识论的范畴来说，庄子的“得意忘言”实为认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杂家在《吕氏春秋》中也以“伊挚不能言鼎”的寓言表明自己言不尽意的立场。魏晋时期的荀粲和王弼也是言不尽意论的代表人物，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说：“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现象；象生于意，故可寻意以观象。”“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王弼提出了语言如何产生的问题，他认为言是由意即意义产生的。“言生于象”；“象生于意”这就是说从语言中并不能得到意义（义理），但是要获得意义必须要经过语言阶段。^②言不尽意者不是认为语言没有认识作用，而是明察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微妙关系，认为语言表达意义，但不能表达最深层、最精微的意义，也

^① 欧阳建：《言尽意论》《全晋文》卷一〇九，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第2084页。

^② 徐杭生：《魏晋玄学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就是荀粲所说的“理之微者”，并且认为“言”所不能完全表达的“意”，可以由“象”来表达。“象”的引入，丰富了言意之辨的内容。

哲学意义上的言意关系，实质上是讨论语言和思想认识的关系，古代学者的讨论，指出了语言不可能与思想（即“意”）完全吻合，言不尽意的情况会经常出现，但是语言毕竟是“意”的表达，语言是离不开思想的。这种思想对文学艺术及语言学有重要影响，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含蓄论、意境论的思想基础，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言和意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于现代的语义学、语用学理论都有先导作用，我们对双重意义的研究也在不少地方受到前人的启发。

总起来看，该期的双重意义修辞研究处于萌芽状态。古人虽然对一些在我们看来属于双重意义修辞的语言现象给予了关注，收集了不少语例，也对一些特殊表达式的特点进行了说明，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关注和说明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双重意义修辞研究。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首先，古人的兴趣点在一些特殊的语言表达式及其特殊的表达效果上，并没有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作为特殊话语类群加以考察的自觉意识。其次，从方法上看，以直观法和归纳法为主，比较重视事实的罗列和评点，而缺少系统的理论分析。这和修辞学在当时达到的水平是一致的。古代的语言之辨虽然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但并没有具体贯彻到双重意义修辞的研究中。

二、修辞格本位研究时期：20世纪初到80年代

20世纪初期，随着现代修辞学学科地位的逐步确立，修辞学研究进入自觉状态，修辞学论著开始出现。这些修辞学论著主要以辞格研究为主，一些属于双重意义修辞的语言现象以辞格的形式也出现在现代修辞学著作中。如1905年出版的汤振常的《修辞学教科书》所论述的十多种辞格中就提到转义类的（本于类似者、因乎关系者、根乎反对者），其中本于类似者中的隐喻和混喻中的